



上海市律师协会
银行业务研究委员会

法讯参考

二〇二三年六月
总第三十八期

01

行业动态

五部门印发《关于金融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指导意见》

央行就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估值业务管理办法 公开征求意见

央行、外管局持续优化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管理政策

内地与香港“互换通”业务正式上线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布2023年第一季度银行业保险业消费投诉情况通报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正式挂牌，何立峰出席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揭牌仪式

央行发布2023年一季度末金融业机构总资产统计

02

行业新规

《关于金融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指导意见》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估值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关于印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企业赴澳门发行债券专项扶持办法>的通知》

03

研究文章

《可持续发展关联贷款：贷款行业组织发布的模板条款》-金杜律师事务所

《金融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前瞻——刘贵祥专委讲话稿研读（中）：金融借款等传统金融纠纷及融资担保纠纷的法律适用》-金杜律师事务所

《金融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前瞻——刘贵祥专委讲话稿研读（下）：有效治理“逃废债”的法律适用及金融民刑交叉案件审理》-金杜律师事务所

• 五部门印发《关于金融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指导意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重要精神和中央一号文件部署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指导意见》，对做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金融服务、强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金融支持、加强农业强国金融供给等九个方面提出具体要求。《意见》强调，各金融机构要主动对接粮食生产主体扩大产能、设备改造、技术升级等融资需求，促进粮食稳产增产。《意见》明确，要强化精准滴灌和正向激励，加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力度，加强财政金融政策协同，形成金融支农综合体系。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将继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动健全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现代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引导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提供更强有力金融支撑。

• 央行就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估值业务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6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就《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估值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办法》共十九条，主要参考成熟市场经验和结合我国债券市场实践，围绕估值业务中立性、公允性、专业性、透明性，重点明确估值机构内部治理、估值基本原则、估值方法、信息披露、利益冲突等要求。明确估值机构的信息披露、内控管理、利益冲突、咨询与投诉等要求。明确估值产品信息披露的原则和披露的内容，要求估值机构建立估值产品质量监测机制和内部评审机制、利益冲突避免机制、用户对估值产品的反馈机制等。

• 央行、外管局持续优化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管理政策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更好支持总部经济发展，日前，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在北京、广东、深圳开展试点，优化升级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管理政策。主要内容包括：一是优化整合现有跨国公司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相关政策要求，惠及更多企业；二是增大企业跨境资金运营自由度，允许跨国公司根据宏观审慎原则自行决定外债和境外放款的归集比例；三是支持跨国公司人民币开展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四是简化备案流程及资金使用相关材料审核。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将继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深化外汇领域改革开放，进一步提升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水平，不断优化跨国公司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管理相关政策，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 内地与香港“互换通”业务正式上线

2023年5月15日，内地与香港利率互换市场互联互通合作（简称“互换通”）正式上线运行。“互换通”境内外投资者可经由内地与香港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机构在交易、清算、结算等方面互联互通的机制安排，在不改变交易习惯、有效遵从两地市场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便捷地完成人民币利率互换交易和集中清算。同时，人民银行与香港证监会、香港金管局加强监管合作，强化联络协商机制，保障“互换通”平稳有序运行，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互换通”是中央政府支持香港发展、推动内地与香港合作的又一项重要举措。“互换通”的推出，有利于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有利于为境外投资者提供更加便利的利率风险管理渠道，稳步推进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进程。下一步，人民银行将会同香港证监会、香港金管局和两地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机构，根据“互换通”运行情况，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安排，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繁荣发展，推动中国金融市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

•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2023年第一季度银行业保险业消费投诉情况通报

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2023年第一季度银行业消费投诉情况的通报》《关于2023年第一季度保险消费投诉情况的通报》（以下简称《通报》），通报了监管部门接收并转送的银行业保险业消费投诉情况。《通报》指出，监管部门2023年第一季度共接收并转送银行业消费投诉104909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投诉量的中位数为8338.5件，平均每千营业网点投诉量的中位数为698.0件/千营业网点，平均每千万个人客户投诉量的中位数为145.4件/千万个人客户。2023年第一季度，涉及信用卡业务投诉32142件，占投诉总量的30.6%。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严格按照《银行业保险业消费投诉处理管理办法》的规定，继续加大投诉处理监管力度，督促银行保险机构落实主体责任，扎实做好投诉处理工作，加强源头治理，改进服务质量，维护好消费者合法权益。

•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正式挂牌

5月18日上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在京正式挂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出席仪式并揭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领导班子成员和干部职工代表，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以及人民银行、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仪式。据介绍，在原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基础上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促进实现金融监管全覆盖的重大举措。按照《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将统一负责除证券业之外的金融业监管。

• 央行发布2023年一季度末金融业机构总资产统计

6月9日，人民银行官网显示，据初步统计，2023年一季度末，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439.33万亿元，同比增长10.8%，其中，银行业机构总资产为397.25万亿元，同比增长11%；证券业机构总资产为13.71万亿元，同比增长7%；保险业机构总资产为28.37万亿元，同比增长10.5%。金融业机构负债为400.81万亿元，同比增长11.3%，其中，银行业机构负债为364.84万亿元，同比增长11.3%；证券业机构负债为10.42万亿元，同比增长6.7%；保险业机构负债为25.54万亿元，同比增长11.8%。

《关于金融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指导意见》

银发〔2023〕97号

发布日期：2023.06.16

生效日期：2023.06.16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围绕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且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强化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锚定目标，鼓足干劲，建立完善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现代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增强金融服务能力，助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做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金融服务

（一）加大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金融支持力度。

围绕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和吨粮田创建，强化粮食生产主体扩大产能、设备改造、技术升级等融资需求对接，促进粮食稳产增产。聚焦大豆和油料生产、生猪和“菜篮子”工程、油茶扩种和低产低效林改造，持续加大信贷投放力度。以化肥、农药等农资生产购销为切入点，满足农资企业经营发展和农业生产主体农资采购周转资金需求。推广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托管综合金融保险服务模式，推动提升农产品生产专业化社会化服务水平。金融机构要积极参与粮食市场化收购业务，农业发展银行要及时足额发放储备及轮换贷款。

（二）强化高标准农田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服务。

按照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要求，聚焦土壤改良、农田排灌设施等重点领域，在承贷主体、还款方式、贷款期限上给予差异化政策倾斜，探索推广全域综合整治等模式，助力高标准农田新建和改造提升。积极梳理大中型灌区建设和现代化改造、中小型水库及引调水工程建设等重大项目融资需求清单，一对一完善项目融资方案，加大中长期贷款投放。鼓励各地将符合条件的项目整省整市打捆打包，统筹构建多元化贷款偿还渠道，实现项目收益自平衡与经营可持续。

（三）持续加强种业振兴金融支持。

完善重点种业企业融资监测机制，精准满足国家种业基地和重点企业融资需求。鼓励金融机构持续加大对生物育种重大项目、国家育种联合攻关和畜禽遗传改良计划等中长期贷款投入，创新品种权（证书）、育种制种设施设备等抵质押贷款业务，合理满足育种研发、种子（苗种）繁殖、精深加工、推广销售等环节差异化融资需求，助力“育繁推一体化”发展。用好现代种业发展基金，鼓励天使投资人创业投资基金等加大资金投入。

（四）做好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金融服务。

树立大食物观，引导金融机构丰富生物性资产抵质押信贷产品种类，助力构建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植物动物微生物并举的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优化信贷资源配置，支持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积极满足规模化标准化稻渔综合种养、大水面生态渔业、陆基和深远海养殖渔场建设、远洋渔业资源开发等领域信贷需求，加快现代海洋牧场和渔港经济区建设。

二、强化对农业科技装备和绿色发展金融支持

（五）做好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金融服务。

坚持产业需求导向，开辟贷款绿色通道，加大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金融支持力度。针对农业科技创新周期长等特点，加大中长期贷款投放，更好发挥农业产业化基金、农业科技创新投资基金引导撬动作用，为农业领域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平台建设给予长期稳定金融支持。

（六）加大现代设施农业和先进农机研发融资支持力度。

依托设施农业现代化提升行动，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加大对粮食烘干、设施农业生产、农产品产地冷藏、冷链物流设施、畜禽规模化养殖和屠宰加工、水稻集中育秧中心、蔬菜集约化育苗中心等领域金融支持力度。鼓励拓展农村资产抵质押范围，满足大型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小型机械和园艺机械、中小养殖户适用机械研发的合理融资需求。稳妥发展农机装备融资租赁，促进先进农机装备推广应用。

（七）加强农业绿色发展金融支持。

引导金融机构创新种植业固碳增汇、养殖业减排降碳、绿色农机研发等领域信贷产品，加大对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信贷支持力度。推广林权抵押贷款等特色信贷产品，探索开展排污权、林业碳汇预期收益权、合同能源管理收益权抵质押等贷款业务。探索多元化林业贷款融资模式，加大中长期信贷支持力度，支持林下经济发展。强化碳减排支持工具等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继续加大对符合条件的农村地区风力发电、太阳能和光伏等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支持力度。

三、加大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金融资源投入

（八）支持农产品加工流通业做大做强。

聚焦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积极开展订单、应收账款等质押贷款业务，支持各类主体发展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和精深加工。加大对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农产品电商产业园、产地冷链集配中心、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基地建设金融支持力度，助力市场流通体系与储运加工布局有机衔接。鼓励供应链核心企业通过链条白名单确认、应收账款确权、设立购销基金等多种方式为上下游企业担保增信，提升链上企业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可得性。优化进出口贸易和对外投资金融服务，强化国际合作，支持有实力有意

愿的农业企业“走出去”，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粮商。

（九）推动现代乡村服务业和新产业新业态培育发展。

充分挖掘乡村多元价值，创新特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全力支持乡村餐饮购物、旅游休闲、养老托幼等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加大中长期贷款投放，合理满足农业产业强镇、现代农业产业园、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建设融资需求。依法合规加强与电商企业合作，探索建立健全信用评级、业务审批、风险控制等信贷管理机制，支持“数商兴农”和“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建设，助力发展电商直采、定制生产、预制菜等新产业新业态。

（十）支持县域富民产业发展壮大。

金融机构要创新开发具有地域亮点的金融产品，依托各地农业农村特色资源，“一链一策”做好“土特产”金融服务，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综合运用专用账户闭环管理、整合还款来源、建设主体优质资产抵质押等增信措施，积极满足县域产业园区建设和企业发展资金需求。

（十一）促进农民创业就业增收。

围绕制造加工、物流快递、家政服务、餐饮、建筑等农民工就业集中行业，鼓励金融机构将企业社保缴费、职业技能培训、稳岗纾困情况等纳入授信评价体系。持续加大对返乡入乡创业园、农村创业孵化实训基地建设信贷资源投入，深化银企对接，带动更多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创业就业。加大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实施力度，鼓励各地因地制宜适当放宽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简化审批流程，积极满足农民工创业信贷需求。

四、优化和美乡村建设与城乡融合发展金融服务

（十二）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支持。

鼓励建立健全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项目库，强化信息共享和服务对接，加大对产业园区、旅游景区、乡村旅游重点村一体化建设信贷支持力度。在依法合规前提下，根据借款人资信状况和偿债能力、项目建设进度、投资回报周期等，创新匹配度高的金融产品和融资模式，合理满足农村规模化供水工程建设和小型供水工程标准化改造等金融需求。鼓励金融机构通过组建银团等方式，合力支持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十三）做好县域基本公共服务金融配套支持。

推进金融与教育、社保、医疗、社会救助等县域民生系统互联互通，打造功能集成、管理规范、标准统一的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与金融服务融合发展新模式。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在行政服务中心设立普惠金融服务窗口，提供金融政策咨询、融资需求交办、金融辅导等服务，提升县域基本公共服务便利性和金融服务普惠性。

（十四）提升新市民金融服务水平。

充分运用信息技术，精准评估新市民信用状况，创新契合度高的信贷产品，提升金融供给质量和金融服务均等性。加强与地方政府信息共享和公用数据直连，丰富“金融+生活+政务”新市民金融服务场景。鼓励运用信贷、债券、资产支持证券、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等方式，支持专业化、规模化住房租赁企业发展，依法合规加大对新市民等群体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融资支持力度。扩大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支持新市民就业创业、安家落户、子女教育、健康保险和养老保障。

（十五）改善县域消费金融服务。

完善农村电商融资、结算等金融服务，优化县域消费者授信审批和风控管理，提高消费金融可得性。鼓励通过线上办理、免息分期等方式，稳步推进低门槛、小额度、纯信用农村消费贷款，为县域各类消费场景提供个性化信贷产品，将金融服务嵌入衣食住行。

五、强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金融支持

（十六）加大对脱贫地区和脱贫人口金融支持力度。

立足脱贫地区资源禀赋和产业特点，科学制定信贷投放计划，发展特色农产品保险，推动脱贫地区更多承接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培育壮大优势特色产业，支持有条件的农户发展庭院经济。保持脱贫地区信贷投放力度不减。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金融支持力度，不断提高县域存贷比，努力降低融资成本。加大对安置区后续发展金融支持力度。扎实做好脱贫人口小额信贷质量监测和续贷展期管理，严禁“户贷企用”。研究谋划过渡期后金融接续支持政策，分层分类做好脱贫人口、防止返贫监测对象和有劳动能力低收入人口金融服务，完善欠发达地区常态化金融帮扶机制。

（十七）深化金融机构定点帮扶工作。

承担中央单位定点帮扶任务的金融机构要把定点帮扶作为服务乡村振兴、建设农业强国、锤炼干部队伍的重要平台，围绕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重点任务，发挥金融组织优势和社会协同能力，创新帮扶举措，督促政策落实，确保结对关系调整优化平稳过渡，不断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努力把金融定点帮扶“责任田”建设成金融政策落地、普惠金融实现、信用价值彰显、风险防控有效的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示范田”，助力帮扶地区农业全面提升、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六、加强农业强国金融供给

（十八）强化金融机构组织功能。

开发性政策性银行要立足职能定位，在业务范围内加大对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农业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中长期信贷支持力度。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要发挥资源、机制、科技等优势，加强线上线下协同，增加乡村振兴领域

信贷投入。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要立足本土、专注支农支小，强化“三农”领域信贷资源配置。加快农村信用社改革，推动省联社转换职能，规范履职行为，稳步推进村镇银行结构性重组，强化风险防范化解，增强“三农”金融服务能力。鼓励金融机构在园区和社区增设服务乡村振兴、新市民等群体特色网点，推动基础服务向县域乡村延伸。

（十九）拓展多元化金融服务。

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公司债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资产支持证券、资产支持票据、乡村振兴票据等用于乡村振兴。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国家种业阵型企业、农业科技创新企业上市、挂牌融资和再融资。鼓励金融机构发行“三农”、小微、绿色金融债券，拓宽可贷资金渠道。推动“融资、融智、融商”有机结合，探索“党建共建+金融特派员下乡进村”模式，创新搭建招商引资、产销对接、融资支持等综合服务平台。持续推进储蓄国债下乡，丰富适合农村居民的理财产品。

（二十）增强保险保障服务能力。

逐步扩大稻谷、玉米、小麦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实施范围，实施好大豆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试点。鼓励发展渔业保险。提高养殖业保险保障水平，探索研发生猪、奶牛等养殖收入保险产品。进一步丰富小农户特色农产品收入保险、指数保险、区域产量保险、农机具综合保险等特色农业保险品类，优化“保险+期货”，强化保险保障功能。支持保险机构扩大农村居民意外伤害险、定期寿险、健康保险、养老保险等产品供给，不断提高承保理赔服务质量。

七、提升农村基础金融服务水平

（二十一）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

依托金融科技赋能乡村振兴示范工程，鼓励金融机构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因地制宜打造惠农利民金融产品与服务，提升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水平。鼓励金融机构优化普惠金融服务点布局，扩大对偏远农村、山区等金融服务半径，推动金融与快递物流、电商销售、公共服务平台等合作共建，形成资金流、物流、商流、信息流“四流合一”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推广完善“乡村振兴主题卡”等特色支付产品，推动移动支付向县域农村下沉。

（二十二）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

支持各地与金融机构共建涉农公用信息数据平台，完善信用信息数据多方采集和分类分级保护机制，强化数据运用有效性和数据存储安全性。持续开展“信用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创建，鼓励金融机构与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合作，开展整村授信、整村担保。金融机构运用征信服务的基础上，要发挥好农业经营主体信贷直通车数据共享作用，用好全国一体化融资信用服务平台等信用体系建设成果，构建信用评价与授信审批联动机制，更好满足各类经营主体合理融资需求。鼓励各地建立恶意逃废金融债务“黑名单”，营造良好区域金融生态环境。

（二十三）加强金融教育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

结合农村地区金融教育基地建设，持续推动金融素养教育、反诈拒赌宣传、金融知识等纳入农村义务教育课程，鼓励各单位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创新开展“金惠工程”“金育工程”等公益项目。持续畅通普惠金融重点人群权利救济渠道，推进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优化金融纠纷在线诉调对接工作，提升金融消费者对金融纠纷调解的认知度、参与度和认可度。加快推进消费者金融健康建设，促进金融健康建设与金融教育、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有机结合。

八、强化金融支持农业强国建设政策保障

（二十四）加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力度。

用好再贷款再贴现、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工具，强化精准滴灌和正向激励，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乡村振兴重点领域信贷支持力度，并适度向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对发展基础好、经营结构稳健、具备可持续能力的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在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等方面给予更优惠的货币信贷政策支持。加强现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在“三农”领域使用情况的统计、信息披露和政策评估。

（二十五）加强财政金融政策协同。

鼓励各地完善风险补偿、财政贴息、融资担保等配套政策，与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形成合力，支持乡村振兴相关领域贷款发放。充分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增信作用，推动“银担”线上系统互联互通，提高代偿效率，加强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绩效评价，强化评价结果运用。支持探索投贷联动模式，鼓励通过农业农村投融资项目库推送重大项目信息。发挥财政、信贷、保险、期货合力，形成金融支农综合体系。

（二十六）推动融资配套要素市场改革。

探索完善农村产权确权颁证、抵押登记、流转交易、评估处置机制，加快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和融资服务平台建设应用。推广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等抵质押贷款业务，优先支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支持活体畜禽、农业生产设施设备、农业仓单、品种权（证书）、应收账款等担保融资业务通过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进行登记。

（二十七）优化金融管理政策。

适度提高涉农贷款风险容忍度，涉农贷款不良率高出金融机构自身各项贷款不良率年度目标3个百分点（含）以内的，可不作为监管评价扣分因素。督促金融机构探索简便易行、客观量化的尽职认定标准、免责情形和问责要求，加快落实涉农贷款尽职免责制度。鼓励金融机构单设服务通道、单列信贷额度、单设考核指标、单授审批权限、单创信贷产品、单独资金定价，稳定加大涉农信贷投入。

九、完善工作机制

（二十八）加强组织领导。

鼓励各地建立健全由金融管理部门、农业农村、地方财政等部门参与的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完善统筹协调和信息共享工作机制，定期研究解决工作推进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严格落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严禁新增政府隐性债务。支持条件成熟的地区创设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探索金融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和可复制推广经验。各金融单位要将金融支持建设农业强国工作与本单位总体工作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鼓励各地加强乡村金融人才培养，推动县乡“三农”工作人员与金融从业人员双向交流。

（二十九）强化评估宣传。

清晰界定乡村振兴金融服务支持的业务范围、领域，健全乡村振兴金融服务统计，各部门要探索建立重点领域融资监测机制。金融管理部门分支机构要持续做好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考核评估工作，强化评估结果运用。金融机构要提高对分支机构和领导班子乡村振兴指标的绩效考核权重。各金融单位要依托线上线下渠道，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加强政策宣传。及时总结提炼金融支持建设农业强国的典型模式、创新产品、经验做法，通过新闻报道、劳动竞赛、优秀案例评选等专题活动加强宣传交流推广，推动工作落实。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估值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发布日期：2023.06.09

为规范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估值业务，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债券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等法律法规，人民银行起草了《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估值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公众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和方式提出反馈意见：

- 一、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意见发送至：faxingchu@pbc.gov.cn。
- 二、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邮寄至：北京市西城区成方街32号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邮编：100080），并在信封上注明“债券估值”字样。
- 三、将意见传真至：010-66016421。

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3年7月9日。

中国人民银行

2023年6月9日

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估值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规范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估值业务，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债券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估值业务，是指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为提供债券估值和债券收益率曲线而开展的研发、编制、发布等活动。本办法所称债券估值产品是指估值机构对外发布的，以债券为编制对象，对市场定价有重要影响且应用广泛的债券估值和债券收益率曲线。

第三条 中国人民银行对银行间债券市场估值业务进行监督管理。

第四条 估值机构应始终保持客观中立，持续提升债券估值产品的公允性，并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 （一）长期稳定运营的能力；
- （二）清晰的组织架构，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和有效的监督机制；

- (三) 稳定、可靠的数据来源，完备的数据采集和处理流程；
- (四) 科学的估值技术和方法，完善的估值产品研发、编制、发布和质量监控流程；
- (五) 配备开展估值业务所需的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和高效完备的信息技术设施；
- (六) 中国人民银行要求的其他条件。

第五条 估值机构应当建立清晰、规范、透明的数据使用标准和层级，所选用的数据能真实反映市场情况。

(一) 对于市场成交活跃的债券，应当优先选取债券发行、交易或可交易报价数据等市场数据；

(二) 对于成交不活跃或因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市场价格发生剧烈变动的债券，应当充分考虑交易规模、交易目的等多种因素，审慎评估成交和报价价格的合理性和适用性，优先采用市场参与者认同度高、可靠性高的市场数据；

(三) 市场数据确实无法使用的，可通过模型或组织专家判断、报价团报价等综合确定适用市场情况的合理数据。相关判断及报价应保证其客观性和可成交性。

第六条 债券估值产品的编制方法应当具有科学性、可比性、可校验性和可回溯性，能够广泛适用于各类场景。

(一) 债券估值应当以准确计量债券公允价值为目标，债券估值方法和估值模型应充分考虑债券条款、发行人财务信用状况、市场流动性等因素；对于证券化类产品的估值，还需考虑基础资产的估值与信用状况。

(二) 债券收益率曲线的编制应当选取科学可靠的曲线构造模型，能够充分反映所衡量对象的真实收益率水平。

(三) 债券指数的编制应当充分考虑指数标的债券的市场情况和产品特征，及时、准确反映指数标的债券的价格走势。

第七条 估值机构应至少公开披露以下信息，并保证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和有效性。

(一) 估值产品信息，包括估值产品名称、发布方式、传输渠道、发布频率等；

(二) 估值方法，包括计算模型、重要参数，涉及筛选样本的，应当明确样本筛选标准和规则；

(三) 数据来源及使用层次，使用专家报价、报价团报价的，应当披露采用专家报价、报价团报价的使用条件和具体规则；

- (四) 内部控制和内部监督安排及重大利益冲突情况；
- (五) 估值产品质量年度检验报告；
- (六) 编制方法修订的，应当提前披露拟修订的具体内容、修订原因、预计修订时间、对用户意见的采纳情况等；
- (七) 传输方式发生调整的，应提前告知市场投资者，并设置过渡期或并行期；
- (八) 其他对估值产品有重要影响的信息。

第八条 估值机构应当建立包括事前分析、事中监控和事后检验在内的估值产品质量监测机制和内部评审机制，定期对估值产品的准确性、估值方法的合理性和编制流程的合规性进行检查。

首次编制的债券产品估值方法或对编制方法修订的，应在发布前广泛征求市场成员意见，并经内部评审机制审议，内部评审机制人员应当由独立于估值机构的编制人员组成。

第九条 估值机构应当建立完善的利益冲突避免机制，包括但不限于：

- (一) 估值机构及其所属人员不得参与所估值资产的交易，不得与相关市场主体进行不当利益交换或操纵估值；
- (二) 估值产品与其他业务应当相隔离，确保估值业务不受到其他商业行为的不当影响；
- (三) 估值产品业务内部应当制定编制人员和质量监控人员的隔离措施，建立可靠的授权程序和监督机制；
- (四) 估值产品业务相关人员应当独立于估值产品的直接利益相关方，且其薪酬不直接或间接地与估值产品结果相关联；
- (五) 市场机构认为与估值机构利益冲突的其他行为。

第十条 估值机构应当建立用户对估值产品的反馈机制，接受用户的质询。估值机构应明确咨询与投诉结果的反馈时间，对所质询的估值结果，应提供可回溯、可校验的相关信息，保留咨询与投诉相关文档，确保投诉处理人员与估值编制人员相独立。

对市场机构反馈集中的问题，估值机构应当公开反馈意见，并定期开展用户满意度调查，不断优化咨询与投诉流程。

第十一条 估值机构应当针对市场中断、不可抗力、系统故障等可能导致估值产品中断的极端情形制定应急处置方案。估值产品发生中断的，估值机构应及时披露有关原因和处置方案并尽快恢复。

估值产品发生错误的，估值机构应当及时披露，并说明原因及修正方案。

第十二条 估值机构因市场环境、产品变化等原因暂停、变更、终止估值产品的，应当充分征求市场成员意见，并经内部评审机制通过后实施。

估值机构因破产导致无法继续履行估值产品编制职责的，估值机构应及时向市场投资者告知。破产估值机构转让估值产品的，受让机构应满足本办法对估值机构要求，估值机构应与受让机构签订协议，并移交相关文档。

第十三条 估值机构应妥善保存估值业务相关文档，文档保留期限为至少二十年，以备监管和审计问询。相关文档包括但不限于编制估值产品所用数据、编制方法及修订情况、编制人员信息、咨询与投诉记录。

第十四条 估值产品用户应定期评估所使用估值产品的质量，并择优选择估值机构。鼓励选择多家估值机构的产品，发挥不同模式估值的交叉验证作用，防范单一估值产品错漏或终止的风险。

第十五条 鼓励估值机构聘请独立且具有丰富经验和能力的审计机构，对估值产品的编制方法、编制流程等的遵循情况定期审查。

第十六条 估值机构应根据本办法要求制定完善内部管理流程，按年向中国人民银行报告估值产品质量报告。发生重大问题的，应当第一时间向中国人民银行报告。

银行间市场自律组织对估值业务进行自律管理。

第十七条 对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的，由中国人民银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等法律法规进行行政处罚。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X年X月X日起施行。

《关于印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企业赴澳门发行债券专项扶持办法>的通知》

发布日期：2023.06.08

生效日期：2023.06.20

执委会各局：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企业赴澳门发行债券专项扶持办法》已经合作区执委会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合作区金融发展局反映。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金融发展局

2023年6月8日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企业赴澳门发行债券专项扶持办法

第一条 制定目的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积极发挥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下简称合作区）作为促进澳门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澳门特区）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新平台的作用，支持澳门特区债券市场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企业中长期外债审核登记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结合合作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定义

为适用本办法的规定，下列用词的定义为：

（一）债券，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以其控制的注册在境外企业名义，在澳门特区发行的、以人民币或者外币计价、按约定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且该有价证券符合澳门金融管理局相关债券发行指引的要求，并且全数由澳门中央证券托管系统登记、托管及结算；

（二）企业，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控制的注册在境外的企业；

（三）中介机构，是指为前述企业赴澳门特区成功发行债券提供服务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信用评级机构、绿色和可持续债券的外部评审认证机构；

（四）控制，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拥有境外企业半数以上表决权，或者虽不拥有境外企业半数以上表决权，但能够支配企业的经营、财务、人事、技术等

重要事项：

（五）债券一般发行费用，是指承销费用、律师事务所费用、会计师事务所费用、信用评级机构费用、澳门中央证券托管系统托管及结算费用，以及澳门交易机构的发行服务费用及上市费用；

（六）外部评审费用，是指与绿色和可持续债券发行相关的外部评审机构费用，包括发行前外部评审（包括但不限于认证、第三方意见、验证、ESG评分/评级、保证、就设立绿色和可持续融资框架提供的咨询服务）和发行后外部评审或者报告费用；

（七）本办法所指金额的币种，除明确说明外，均为人民币。本办法涉及汇率换算均以发行日中国人民银行官网发布的汇率作为计算基准。

第三条 适用条件

申请本办法扶持资金的扶持对象需满足以下基本条件：

（一）应当符合第2/2023号执行委员会规范性文件《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企业实质性运营认定规则》规定的实质性运营条件；

（二）申请至审核完成时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及相关部门公布的经营异常名录。

合作区企业以其控制的注册在境外企业的名义发行债券的，以合作区企业为申请人申请扶持资金，应当符合上述全部条件。

企业在澳门特区发行一年期以上债券前，应当按照《企业中长期外债审核登记管理办法》规定办理外债审核登记等手续。

企业申请绿色和可持续债券扶持的，需要通过外部评审机构相关评审认证。

第四条 扶持标准

对符合本办法要求的扶持对象，按照以下标准给予资金扶持：

（一）按照企业实际募集资金规模的百分之二给予一次性债券一般发行费用资金扶持，最高不超过五百万元。发行债券被认定为绿色和可持续债券的，除上述资金扶持外，对外部评审费用按实际发生金额进行扶持，最高不超过五十万元。每家企业每年扶持金额累计最高不超过五百五十万元；

（二）中介机构按照每次向赴澳门特区成功发行债券的企业提供专业服务对应的合同载明的金额予以扶持，最高不超过五十万元。每家中介机构每年扶持金额累计最高不超过一百万元。

第五条 申请流程及申请材料

合作区金融发展局受理申请，申请流程如下：

（一）系统申请。申请本办法扶持资金的申请人根据受理申请通知要求，登录申请系统填写申请表并上传以下材料。除申请表外，以下其余材料均为复印件，复印件需加盖申请人单位公章上传系统，原件备查；

1. 企业所需材料：在合作区实质性运营证明材料，控制权关系证明材料（仅限于合作区企业以其控制的境外企业作为发债主体的情形），国家相关部委出具的企业借用外债审核或登记证明材料（仅限发行一年期以上债券），债券募集说明书，债券在澳门中央证券托管系统登记、托管及结算的证明材料，绿色和可持续债券相关证明材料（若有）；

2. 中介机构所需材料：在合作区实质性运营证明材料，与发债企业签订的服务合同以及服务合同对应的发票。

（二）受理。合作区金融发展局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不符合受理条件的，不予受理；材料不全的，一次性告知需补齐的材料，申请人须在规定时间内补齐材料；符合受理条件且材料齐备的，予以受理；

（三）审核。合作区金融发展局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

（四）资金审定。合作区金融发展局审定申请项目及相应资金给付清单；

（五）公示。合作区金融发展局将拟给予扶持的对象名单和金额在合作区官方网站公示五个工作日；

（六）资金拨付。公示期满无异议或者经调查异议不成立的，由合作区金融发展局按规定拨付资金。

本办法接受发行前预审。企业可在债券发行前，基于中介机构提供的专业建议，向合作区金融发展局申请预审。扶持资金在企业成功发行债券后按流程拨付。

第六条 监督管理

依据本办法发放的扶持资金接受有权机关的审计、监督和社会监督。

申请人应当保证其申请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准确性及合法性。对弄虚作假骗取扶持资金的合作区企业及中介机构，一经查实，申请人不得再次申请本办法扶持；对已收到扶持资金的，要求退还已取得的资金，并按当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息。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移送有权机关处理。

申请人在申请扶持资金时，应当书面承诺自获得最后一笔扶持资金起五年内不迁出合作区，不改变在合作区的纳税义务。如有迁出或者注销的，应一次性退还所有扶持资金并按当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息。

除另有规定外，申请人在申请本办法扶持的同时不影响其申请国家、广东省其他政策扶持和优惠。但是申请人已享受合作区其他同类扶持政策，不得重复享受本办法扶持。

第七条 组织实施

本办法由合作区金融发展局负责解释并组织实施。

第八条 施行日期和有效期

本办法自2023年6月20日起执行，有效期三年。

2023年3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符合本办法扶持条件的，可于2024年申请扶持资金。

《可持续发展关联贷款：贷款行业组织发布的模板条款》

来源：金杜研究院
作者：金杜律师事务所
马绍基、萧乃莹、费思

随着环境、社会和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在金融领域日益成为焦点，可持续发展关联贷款（sustainability-linked loan; “SLL”）继续在包括亚洲在内的全球主要市场保持上升趋势。例如，蚂蚁集团于2022年底将一笔65亿美元的贷款转换为SLL，该笔贷款也成为亚洲规模最大的SLL。亚洲的其他主要银行和借款人也正在积极参与SLL项目。

在此背景下，贷款市场协会（Loan Market Association; “LMA”）近期发布了草拟的SLL模板条款。该SLL模板条款可以被插入到LMA现有的标准贷款协议中，从而将标准贷款协议转换为SLL协议。本文将借助LMA的模板条款探讨SLL的主要特征。

01 什么是SLL？它有什么主要特征？

为了促进SLL市场的发展并保持其稳健性，总部位于伦敦的LMA、总部位于纽约的银团贷款交易协会（Loan Syndications and Trading Association）以及总部位于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亚太区贷款市场公会（Asia Pacific Loan Market Association）共同发布了《可持续发展关联贷款原则》（“《SLL原则》”）。《SLL原则》（第一版于2019年发布，最近于2023年4月更新）阐述了SLL的核心要件。尽管《SLL原则》是一份非强制性的指引性文件且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市场参与者应只将符合《SLL原则》的贷款称为SLL。

《SLL原则》将SLL定义为任何贷款工具（例如定期贷款、循环贷款等），其利率或其他关键经济特征与借款人是否实现事先协商一致的可可持续发展绩效指标相挂钩。例如，如果借款人在特定年度内达到了协议中规定的所有与ESG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则贷款的利率将会降低，进而为借款人降低融资成本。相反，如果借款人未能达到任何此类目标，贷款的利率将会增加。通过将贷款的经济特征与借款人的可持续发展绩效相挂钩，SLL鼓励借款人在贷款存续期间改善其在可持续性发展方面的表现，并为此提供降低融资成本的奖励。

SLL包含关键绩效指标（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KPI”），即借款人在ESG相关领域表现的可衡量指标。KPI的例子包括：（a）借款人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减少程度；（b）借款人对可再生能源的依赖程度；以及（c）借款人的员工或管理团队的多元化程度。SLL还包含了为每一项KPI设定具体目标的可持续发展绩效目标（sustainability performance target; “SPT”）。例如，如果一项KPI涉及到减少借款人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则相应的SPT可能是：贷款第一年的借款人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2.5%，第二年的排放量减少3.75%，第三年的排放量减少5%。

值得强调的是，为将贷款归类为SLL，借款人并不需要将贷款资金用于实现ESG相关目的。

这说明SLL与“绿色贷款”或“社会贷款”有所区别——后两者分别要求将贷款用于符合条件的绿色项目或社会项目。这也意味着，任何一笔遵循《SLL原则》规定的贷款（包括用于一般企业用途的贷款）都可以成为SLL。SLL并不对贷款用途提出具体要求，这使得SLL对广大范围的借款人都具有吸引力，因为并非所有借款人都有符合条件且具有融资需求的绿色或社会项目。

然而，SLL并非仅包括KPI和SPT。SLL必须同时满足《SLL原则》中规定的五个核心要件，简述如下：

SLL的核心要件	《SLL原则》规定的关键要求
1. 选择KPI	一笔SLL的ESG可信度取决于选择适当的KPI。KPI必须： (a) 与借款人的可持续发展业务和商业策略相关； (b) 可以使用客观的计算方法进行测定和量化； (c) 能够与适用的行业标准进行比较。
2. 设定SPT	在贷款存续期间，设置SPT的水平须基于雄心勃勃且具有挑战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且应与借款人的业务相关。这意味着SPT应体现借款人可持续发展情况的实质性改善，并超越借款人在正常经营情况下无论如何都能实现的目标和根据适用的法律法规所必须实现的目标。
3. 贷款的特征	SLL的经济条款应与一个或多个SPT是否达成相关联。通常情况下，这种与可持续发展的关联是通过利差棘轮来实现的。
4. 报告	借款人应当至少每年向贷款人提供： (a) 一份可持续性合规证明书或声明并附上审核报告（审核要求将在下文探讨）；及 (b) 使贷款人得以评估SPT的设置水平对借款人而言仍然基于雄心勃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且与其业务相关的最新信息。具体而言，可持续性合规证明书/声明应当描述借款人在过去一年针对SPT的具体表现（包括计算细节及相关假设条件），及其对贷款经济条款的影响（例如利差增加或降低的程度）。
5. 审核	在贷款存续期间，借款人必须针对每个参考期间的每个SPT获得独立的外部审核。上述审核应当由独立的外部专家（例如审计师、环境咨询师或评级机构）完成。

02 LMA发布的SLL模板条款

LMA发布的SLL模板条款反映了《SLL原则》提出的关键要求。这些条款可以作为磋商贷款协议中SLL条款的起点。在经过协议各方适当调整后，SLL模板条款可以被插入到LMA

的标准杠杆收购贷款协议中，将其转变为SLL协议。这些模板条款也可以加以调整从而被插入到LMA的其他标准贷款协议中。

SLL模板条款首先提供了“KPI”和“SPT”等与SLL相关的关键概念的定义。这些定义在经过协议各方适当调整后，可以被加入到标准LMA贷款协议的定义部分。SLL模板条款中的许多定义参考了将要纳入贷款协议中的名为“可持续性计算”的新附表中的有关信息。可持续性计算附表包含对每个KPI的描述、其所对应的ESG衡量标准、计算方法以及在贷款存续期间内的每个“SLL参考期间”（通常为一年）与该KPI相对应的SPT。其他与SLL相关的关键定义包括“外部审核人”（各方必须在该定义中加入负责审核每个KPI的独立外部审核人的名称）、“可持续性修订事件”和“归类取消事件”。这些定义将在下文进行探讨。

值得注意的是，SLL模板条款对贷款协议中“利差”的标准定义进行了修改，规定利差水平可以根据名为“可持续性利差调整”的新条款进行调整。这个新条款是SLL协议的核心，因为它包含了利差棘轮机制，根据SLL参考期间内借款人是否达成全部、部分或没有达成任何SPT，来对贷款的利差进行向下或向上的调整。例如，在一笔含有四个KPI和相对应的四个SPT的SLL中，利差棘轮机制可能规定，如果四个SPT均被达成，则在相关SLL参考期间内贷款的利差将减少10个基点；如果只达成四个SPT中的三个，利差只会减少5个基点；如果没有达成任何一个SPT，利差将增加10个基点。贷款协议各方可以自由确定SPT的数量和具体的利差棘轮机制，包括为不同的SPT分配不同的权重。

“可持续性利差调整”条款还包含一项凌驾性规定，即只要借款人违反了“可持续性条款”，其将被视为没有满足任何SPT。可持续性条款包括：（a）要求借款人陈述和保证其所提供的所有可持续性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均为真实、完整和准确的条款；（b）要求借款人向贷款代理行提交符合可持续性合规证明书、可持续性报告和审核报告的条款；（c）要求借款人在贷款代理行要求时提供额外可持续性信息的条款；以及（d）要求借款人遵守与可持续性修订相关的义务的条款。

利差棘轮的基础是借款人在SLL协议的一个参考期间内达成多少个SPT，而这又基于可持续性合规证明书中的信息。SLL模板条款包括一个名为“可持续性合规证明书、可持续性报告和审核报告”的新条款，要求借款人在每个SLL参考期间结束时向贷款代理行提供一份可持续性合规证明书。简而言之，符合SLL模板条款要求的可持续性合规证明书必须：

（a）详细说明借款人针对每个KPI下的SPT的表现（包括相关计算细节）以及就此进行的可持续性利差调整；（b）附上借款人在SLL参考期间的可持续发展报告（该报告通常由借款人每年度公开发布）；（c）附上由外部审核人针对每个KPI准备的审核报告；（d）确认可持续发展报告和审核报告的正确性和完整性；及（e）由借款人的两名董事签署。SLL模板条款还包含可持续性合规证明书的格式，其将作为一个新的附表纳入到贷款协议中。

如果借款人发现可持续性合规证明书中有任何不正确内容，必须通知贷款代理行，并交付更正后的证明书。可持续性利差调整将根据更正后的证明书重新计算，并且借款人必须进行调整支付，以消除先前不正确版本的影响。

根据SLL模板条款，如果发生“可持续性修订事件”，借款人必须通知贷款代理行并提出对任何KPI、SPT或与之相关的计算方法的修订方案（“可持续性修订方案”），以消除或考

考虑“可持续性修订事件”的影响，且贷款协议各方应致力于就上述修订达成一致。SLL模板条款允许贷款协议各方自行确定是否需要获得特定多数贷款人或所有贷款人的同意方可批准可持续性修订方案，因为目前就这一点尚未形成市场惯例。“可持续性修订事件”的定义包括借款人进行合并或收购或处置其资产或业务，且该合并/收购/处置可以合理地预期会影响任何KPI或SPT。

根据SLL模板条款，如果发生“SLL归类取消事件”，贷款人可以要求贷款代理行不再将贷款归类为SLL。一笔贷款的SLL归类被取消后，可持续性利差调整将不再适用该贷款，并且借款人将不再被允许将该贷款宣传或描述为SLL。贷款协议各方还可以修改SLL模板条款，额外要求借款人删除过去有关该贷款属于SLL的任何描述。在SLL模板条款中，“SLL归类取消事件”的定义包含一系列构成归类取消事件的事项。然而，SLL模板条款仅描述了这一系列归类取消事件中的第一个，即贷款协议各方未能在可持续性修订事件发生后的特定期限内就可持续性修订方案达成一致。SLL模板条款有意地留空了其他SLL归类取消事件的描述，以供各方自行填写。因此，各方应考虑是否在贷款协议中加入其他SLL归类取消事件，例如借款人一直无法达成SPT或借款人违反可持续性条款且长期未纠正等情况。

最后值得强调的是，SLL模板条款澄清，贷款协议下的违约事件不会仅仅因为借款人未能遵守可持续发展条款或就可持续发展相关信息提供不实陈述而被触发。这意味着，违反可持续发展条款的主要后果将是根据可持续性利差调整条款而产生更高的利差，而非触发更为严重的、可能导致担保或保证权的行使、贷款加速到期和/或借款人在其他融资安排下出现交叉违约的违约事件。

总结

LMA发布的SLL模板条款是SLL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随着《SLL原则》和市场实践的不断演变，我们预计SLL模板条款将会被定期更新。同时，SLL模板条款为准备SLL法律文件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起点，并有望使ESG融资这个日益重要的融资形式在法律条款方面变得更加标准化。

《金融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前瞻——刘贵祥专委讲话稿研读（中）：金融借款等传统金融纠纷及融资担保纠纷的法律适用》

来源：金杜研究院
作者：金杜律师事务所
王团团、李盛

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刘贵祥大法官在全国法院金融审判工作会议（“金融审判会议”）上发表的题为“关于金融民商事审判工作中的理念、机制和法律适用问题”的讲话（“讲话稿”），我们已在上篇中聚焦“关于进一步深化对金融审判理念的认识问题”“关于完善金融审判工作机制问题”及“关于金融监管规章在金融民商事审判中的适用问题”等三个专题作了学习研讨。本篇为本系列中篇，我们紧扣“关于金融借款等传统金融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和“关于融资担保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这两个专题，结合项目经验和实践思考展开进一步的研究。本系列下篇将着眼争议解决领域两个前沿症结即“关于有效治理‘逃废债’的法律适用问题”和“关于金融民刑交叉案件审理问题”展开探讨。

01 关于金融借款等传统金融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对于金融借款等传统金融纠纷领域的法律适用，讲话稿集中讨论了以下需要统一认识的三大问题：



1. 需要统一认识的三大问题之一：金融机构和地方金融组织在开展融资性金融服务过程中收取的利息和费用的认定

（1）明确了“未明示不支持”的裁判原则，要求金融机构在相关合同当中必须明确约定贷款产品的年化利率，并且要让借款人“理解”和“注意到”贷款的实际融资成本。

1) 对没有明示的利息不予支持：对于没有明示的利息，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明示贷款年化利率的公告》（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21〕第3号）第一条明确规定，所有从事贷款业务的机构，在网站、移动端应用程序、宣传海报等渠道进行营销时，应当以明显的方式向借款人展示年化利率，并在签订贷款合同时载明，也可根据需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第二批贯彻实施民法典典型案例之四

法院认为：涉案贷款合同明示的贷款年化利率是13.1%，同时格式条款规定每期还款利息以初始贷款本金来计算，此规定改变了等额本息每期利息应按期初剩余本金计算的通常计算方式，年化利率近23.4%，导致实际贷款利率严重高于合同明示贷款利率，加重了借款人的还款负担。根据《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即贷款人应当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借款人注意关于利率、还款方式等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但某贷款公司没有提交相应的证据证明其采用合理方式向周某玲提示或者说明实际利率。还款方式，应当认为双方就该格式条款未达成合意，某贷款公司无权据此收取利息。2021年7月20日，判决某贷款公司向周某玲返还多收款项10089.9元。

- 2) 针对贷款年化利率的定义与范围：讲话稿强调了“实际成本”的概念，即贷款年化利率为所有贷款成本与其实占用的贷款本金的比例，其中贷款成本包括利息及“与贷款直接相关的服务费、保证保险费、融资担保费等各类费用”。



山东省东营市河口区人民法院/
(2021)鲁0503民初1649

法院认为：按照银行业从业规范性的要求，贷款年化利率应以对借款人收取的所有贷款成本与其实际占用的贷款本金的比例计算，转化为年化利率。其中贷款成本包括利息及与贷款直接相关的各类费用。

- (2) 明确违反监管政策的息费应当被认定为无效，包括“超额收息”“违规收费”“强制搭售”等行为。

事实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第51条对此已有类似的规定，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借款人认为金融机构以服务费、咨询费、顾问费、管理费等为名变相收取利息，金融机构或者由其指定的人收取的相关费用不合理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提供服务的实际情况确定借款人应否支付或者酌减相关费用。

“应否支付”将引发“质价相符”的认定问题。“服务费”并非一律视作违规收费。实践中，法院通常对金融机构提出较高的举证证明责任要求，并对于客户的实际需要与金融机构的实质性服务严加审查，如存在“强买强卖”情况，则即使金融机构提供实质性服务，也属于违规收费。

最高人民法院/
(2021)最高法民再296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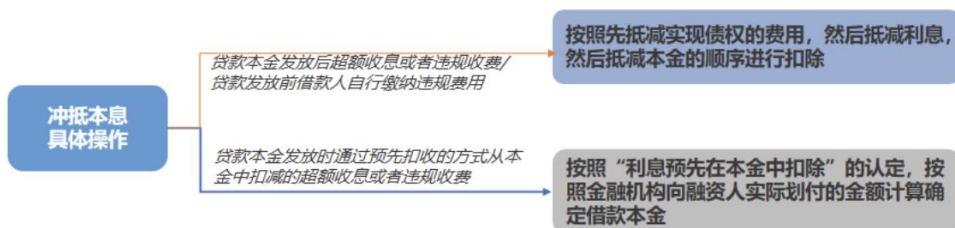
法院认为：金融机构对服务费等相关费用的收取必须质价相符，即商业银行应当根据客户的实际需要，提供价格合理的服务。顾问与咨询类、资金监管类、资产托管类、融资安排类等业务，特别应当体现实质性服务的要求。如果商业银行收取的财务顾问费等费用与其为付费方提供的服务不对等，则属于质价不符。

最高人民法院/
(2021)最高法民终1057号

法院认为：实践中，银行利用其优势地位捆绑贷款强制收取利息或提供中介服务，背离了民法平等、自愿、公平原则，增加了实体经济企业负担。金融监管部门多次发文予以规范和重点整治这一顽疾，为了形成司法和行政的合力，优化营商环境，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实现良性循环，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故对于金融机构收取的变相和不合规费用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加以严格审查。故对于金融机构收取的变相和不合规费用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加以严格审查。

(3) 明确超额收取的利息、违规收取的费用可冲抵本息。

讲话稿该部分内容的法律依据是《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一条及第六百七十条。综合这两个法条理解讲话稿内容，超额收息和违规收费的折算方式可总结如下：



2. 需要统一认识的三大问题之二：适用间接代理制度处理甲贷乙用情况

讲话稿认为，对于实践中实际借款人委托名义借款人从商业银行处取得贷款的情况，应适用《民法典》第九百二十五条、第九百二十六条规定的间接代理制度进行处理。

(1) 商业银行在签订借款合同时知道实际用款人和名义借款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借款合同直接约束商业银行和实际借款人，名义借款人不承担还本付息的合同责任。

《民法典》第九百二十五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是，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鉴于实践中约定借款合同只约束名义借款人与银行的情况极为少见，此时借款合同一般应直接约束实际借款人和商业银行。该意见也与实践中的部分法院的类案裁判思路一致，列举一例以供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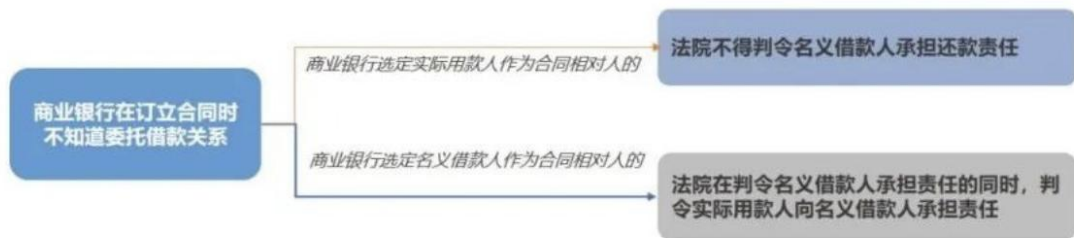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0) 苏02民终3225号

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第三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该合同直接约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确切证据证明该合同只约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本案中，B公司、陈某平、谈某宁、蒋某娟之间的关系符合该条法律规定的间接代理制度的法律特征，本案应适用该条法律来明确各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该条法律规定，蒋某娟作为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在委托人陈某平、谈某宁的授权范围内与第三人B公司订立《借款合同》，B公司在订立合同时知道蒋某娟与陈某平、谈某宁之间的代理关系，该合同直接约束陈某平、谈某宁和B公司。并且，本案中并无确切证据证明《借款合同》只约束受托人蒋某娟和第三人B公司。《借款合同》第十三条虽载明“双方充分知晓并接受本合同条款，愿意受本合同条款的约束”，但因该约定系B公司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的打印内容，且根据本案查明的上述事实，B公司与蒋某娟之间就本案合同的签订并无协商的过程，故仅凭该条合同内容并不足以证明该合同只约束蒋某娟和B公司，因此，本案中并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规定的除外情形。

(2) 商业银行在签订借款合同时不知道实际用款人和名义借款人之间的代理关系的，应当适用民法典第九百二十六条规定，此时商业银行可选择相对人。

《民法典》第九百二十六条规定：“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对第三人不履行义务，受托人

应当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选择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为相对人主张其权利，但是第三人不得变更选定的相对人。”讲话稿强调了此类纠纷的诉讼主体与责任主体，落实了间接代理的相关内容：



3. 需要统一认识的三大问题之三：委托贷款业务不得“穿透”为民间借贷，而应与金融借款合同做相同的处理

（1）金融审判会议前，适用间接代理的规定将委托贷款“穿透”认定为委托人与借款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合同，是司法实践长期以来的误区。

鉴于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29日公布的《关于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适用范围问题的批复》（“《批复》”）明确“由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的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等七类地方金融组织，属于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其因从事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新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并未特别提及委托贷款，造成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法院认为委托贷款合同应基于间接代理的相关规定作穿透认定，适用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规制。

（2）讲话稿明确委托贷款是纳入监管的一项金融业务，不应穿透认定为民间借贷，应当与金融借款合同做相同的处理。

此次讲话稿提出的观点与长期以来的司法实践存在一定差异，不排除对委托贷款的业务开展、争议解决产生较大影响。具体而言：

1) 委托贷款的定义与性质：

- 定义及过往司法实践：根据《贷款通则》（中国人民银行令〔1996年2号〕）第七条，指“由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及个人等委托人提供资金，由贷款人（即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确定的贷款对象、用途、金额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监督使用并协助收回的贷款。贷款人（受托人）只收取手续费，不承担贷款风险”。讲话稿将信托公司依法开展的资金信托贷款业务亦纳入广义委托贷款的范畴。

就狭义委托贷款而言，过往司法实践中常以受托人并未自主决定贷款具体事项、不承担贷款风险为由，认定委托贷款实质为委托人与借款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典型案例如（2021）最高法民申2140号、（2018）最高法民再54号。甚至就信托贷款而言，亦存在案例将通道类信托贷款认定为委托贷款关系，进而认定其实质法律关系为民间借贷，典型案例如（2020）京民终36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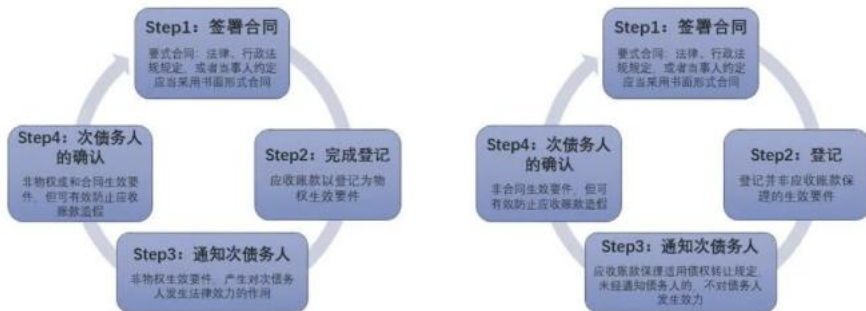
- 讲话稿观点：讲话稿认为不应将委托贷款认定为民间借贷，“委托贷款是纳入监管的一项金融业务，应当与金融借款合同做相同的处理。”
- 2) 委托贷款利率上限：在前述司法案例中，法院往往在认定委托贷款构成民间借贷的基础上，适用民间借贷的利率上限审理案件。如将委托贷款纠纷按照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处理的，根据《批复》的规定，金融机构从事金融业务的纠纷不适用民间借贷利率上限的相关规定。考虑到讲话稿并不构成司法解释，委托贷款纠纷中利率上限的标准，尚有待未来司法实践进一步明确。

02 关于融资担保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讲话稿在《民法典》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担保制度解释》”）完善担保制度的基础上，针对司法实践中呈现的新的疑难问题的法律适用提供了审判思路。

1. 关于应收账款的多重保理（多重质押）及应收账款虚构问题

保理合同为《民法典》新增的有名合同。由于保理与应收账款质押的标的均为应收账款，二者常常被作为相对的法律概念予以分析，也存在大量共性特征，如二者均为要式合同，均须经通知次债务人方可产生对次债务人发生法律效力等作用等。



应收账款质押与保理核心要素对比

讲话稿针对实践中问题频发的多重保理（多重质押）顺位及虚构应收账款所产生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回应。

（1）根据讲话稿精神，登记在后或者未登记的保理人先通知应收账款债务人，应收账款债务人可按照通知向该保理人履行义务，登记在前的保理人可向接受债务履行的保理人主张返还。

针对“同一应收账款同时存在保理、应收账款质押和债权转让的，如何确定保理人、质押权人和债权受让人之间的优先顺位”这一问题，我国已经确立了登记在前的优先顺位原则：《民法典》第七百六十八条明确规定，应收账款债权人就同一应收账款订立多个保理合同，致使多个保理人主张权利的，已经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取得应收账款；《担保制度解释》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进一步解释，对于同一应收账款同时存在保理、应收账款质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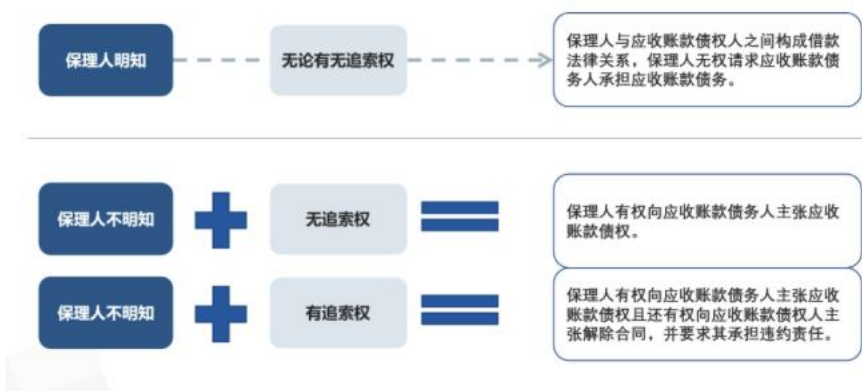
和债权转让的也适用上述权利顺位原则。

但是，实践中往往出现登记在后或者未登记的保理人先通知债务人，此时应如何处理多重保理中的权利顺位问题呢？此次讲话稿从两个层面明晰了该问题的解决路径：

- 1) **从债务人履行效力层面**：债务人按最先到达的有效通知中指明的保理人履行了债务，发生债务消灭的效果。此时，债务人对于其他保理人享有拒绝履行的抗辩权，该等理解也符合《民法典》第五百四十六条债权转让规定的相关要求，即债权转让在通知债务人后方对债务人发生效力，登记本身并不产生通知的效力。
- 2) **从其他保理人权利保障的层面**：根据《民法典》七百六十八条的权利顺位原则，登记在先者享有优先权，但受限于债务人所享有的拒绝履行抗辩权，登记在先者不宜向债务人主张支付，故先办理登记的保理人可以请求已接受债务履行的保理人将所得款项支付给先办理登记的保理人。

(2) 在虚构应收账款情形下，关于保理人能否请求应收账款债务人承担应收账款债务，需要区分具体情形予以分析。

讲话稿明确指出，对于应收账款债权人与债务人虚构应收账款的现象，应当依照《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三条及《担保制度解释》第六十一条进行审理。《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三条明确“应收账款债权人与债务人虚构应收账款作为转让标的，与保理人订立保理合同的，应收账款债务人不得以应收账款不存在为对抗保理人，但是保理人明知虚构的除外”。讲话稿则在此基础上，以“保理人是否明知”以及“有无追索权”对实践中的常见情形明确了司法适用：



需要注意的是，讲话稿是在《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三条的基础上对法律适用进行细化。而对于《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三条的适用前提和构成要件，最高院在其编写的《中国民法典适用大全·合同卷（三）》进行了解释，我们理解如下：

- 1) 《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三条适用前提：保理人可适用该条主张其权利的前提是，保理人因合理信赖权利外观或意思表示外观而进行交易。参考有类似条文的德国法，所谓的权利外观在保理实践的语境下一般可理解为应收账款债务人确认应收账款真实存在的债权确认文书。如案件事实表明，无论应收账款是否真实，保理人均会签订保理合

同的，则该条并无适用空间。

- 2) “善意”的标准：《民法典》未采取“善意无过失”的通常标准，即此处的“明知”指的是事实上的知道而非“应当知道”（即推定的知道）。法律规定将债务人的抗辩事由限定在保理人明知的场合，意在使与应收账款债权人通谋造假的债务人承担不利益的后果。
- 3) 保理人的谨慎核查义务：保理人是否已进行谨慎核查（尽职调查）仍是该类案件中的审判关注要点。虽然本条未采取“善意无过失标准”，但结合民法的一般原则，如保理人在“是否已尽到谨慎核查义务”上存在过错的，不排除在归责比例方面受到一定限制。

2. 关于融资租赁的担保功能

关于融资租赁相关纠纷，讲话稿强调深化对融资租赁的“融物”属性和担保功能的认识，并着重指出了实践中三类典型问题：名租实贷、售后回租和自物抵押。

(1) 融资租赁是以“融物”的方式提供“融资”，没有租赁物不构成融资租赁。

承接此前司法实践倾向，讲话稿提出，对于租赁物是否虚构应当结合买卖合同、付款凭证、发运单证、发票、租赁物的交接手续等相关证据，进行综合判断；对于虚构租赁物“名租实贷”合同，尽管可以通谋虚伪意思表示认定表面形成的融资租赁合同无效，但如无其他法定无效情形，应当认定隐藏的借款合同有效，并可以根据债务人的抗辩对约定的过高利息予以调整。对此，我们在《融资租赁合同纠纷热点问题探析（一）——“虚构租赁物”的认定及对融资租赁合同的影响》一文中已对“租赁物”的范围是否存在限制、租赁物“虚构的具体表现”、租赁物“虚构”对融资租赁合同效力的影响、“出租人审查义务的范围”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这里不再赘述。

(2) 关于“售后回租”是否构成融资租赁的判断，重点不在于出卖人与承租人是否系同一人，而在于是否具备“融物”的本质属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融资租赁解释》”）第二条规定：“承租人将其自有物出卖给出租人，再通过融资租赁合同将租赁物从出租人处租回的，人民法院不应仅以承租人和出卖人系同一人为由认定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在此基础上，讲话稿进一步明确融资租赁的本质属性系“融物”指的是租赁物应具备可流动性、特定化、可使用性的基本要素，且租赁物所有权应转移给出租人，即应登记的已登记、应交付的已交付，包括动产售后回租中占有改定这一非现实交付情形。

(3) 关于特殊动产的“自物抵押”问题，不能仅以所有权和抵押权为同一人为由认定抵押无效。

讲话稿继承了2014年出台的《融资租赁解释》精神，再次重申，不能仅以所有权和抵押权为同一人为由认定抵押无效，当事人可以选择行使抵押权或保留的所有权以实现其担保权利。对此，我们结合刘专委发表的《民商事审判几个方面的法律适用问题》进一步介绍该观点的历史由来及合理性所在：

- 1) **“自物抵押”的立法背景**：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删除《融资租赁解释》第九条对“自物抵押”的规定，并非是认为其与《民法典》冲突，只是认为有统一的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制度后，不会再出现“自物抵押”情形。但是实践中，特殊动产如机动车存在中登网与交通管理部门两套登记系统，且受限于是出租人购买车辆的配额与承租人办理运营资质等因素，交通管理部门层面需将车辆所有权登记在承租人名下，为避免承租人擅自转让租赁物，出租人只得授权承租人将租赁物抵押给自己并在交通管理部门办理抵押登记。
- 2) **“自物抵押”的表面形式**：所谓“自物抵押”，从物权表征看，出租人取得的特殊动产租赁物所有权形式上还登记在承租人名下，而登记的抵押权人是出租人，也符合以他人之物为债权人设定抵押的表征形式。
- 3) **“自物抵押”的法理基础**：融资租赁的租赁物所有权本身就具有担保功能，与“自物抵押”在功能上无实质差别。同时，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十七条规定，同一财产向两个以上债权人抵押的，顺序在先的抵押权与该财产的所有权归属一人时，该财产的所有权人可以以其抵押权对抗顺序在后的抵押权。该规定在实践中已形成共识，“自物抵押”与该规定本质相同，且符合当事人真实意思，应予以肯定。

3. 关于保证保险的法律适用

保险公司开展的融资性保证保险业务，为中小微型企业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城乡居民购车购房及其他消费支出增加了获得贷款的可能性。然而强制搭售、借款综合成本高造成借款人无力还款或拒绝还款已经成为纠纷发生的主要原因。此次讲话稿即针对强制搭售及借款综合成本过高两问题的审判思路进行了强调。

(1) 关于强制搭售的认定，原则上应当以保险保障是否必要和合理作为判断标准。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在2022年12月26日发布的《银行保险机构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银行保险机构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应当保障**消费者自主选择权**，不得存在强制捆绑、强制搭售产品或者服务的情形。在此基础上，讲话稿提出应以必要性和合理性作为“强制搭售”的判断标准。结合过往司法实践，我们理解对于“强制搭售”的认定仍须结合不同案件的具体案情，其核心落脚点为是否侵害消费者自主选择权、是否违背借款人的真实意愿。

- 1) **必要性标准**：即借款人是否已经提供了其他形式的足额担保。讲话稿提出，如借款人已经以不动产或易于变现的动产或应收账款等提供了足额担保，再要求购买保证保险就是违背借款人真实意愿。反之，如（2021）吉0106民初2789号案认为“借款人借款时没有提供任何担保，保险机构提供保证担保系重要增信手段和必要条件，不属于借贷搭售”；
- 2) **合理性标准**：如是否给予消费者对保险产品的自主选择权等。

(2) 关于借款人综合借款成本的裁量，宜把具有合作关系的贷款人、保险公司及担保公

司向借款人收取的费用作为一个整体来计算借款人的综合融资成本。

根据讲话稿观点，在未来的裁判趋势上，可以预见若借款人以其实际承担的贷款利息、保险费用、服务费、手续费等综合贷款成本已经超过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为由，请求相应降低贷款人、保险人及其他助贷机构收取的利息和费率并继续履行合同的，法院将予以支持。

我们理解，讲话稿中关于“**具有合作关系**”的定语应如何理解，有待未来司法实践的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如贷款人和保险公司具有合作关系是否为整体调整融资成本的必要前提条件、如何证明此处的“合作关系”、举证责任如何分配等。

以上是针对讲话稿中“关于金融借款等传统金融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和“关于融资担保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两个篇章的梳理解读，下篇我们将结合立法动向与司法趋势，继续研讨具体争议解决中的两大前沿症结即“关于有效治理‘逃废债’的法律适用问题”“关于金融民刑交叉案件审理问题”。

《金融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前瞻——刘贵祥专委讲话稿研读（下）：有效治理“逃废债”的法律适用及金融民刑交叉案件审理》

来源：金杜研究院
作者：金杜律师事务所
王团团、李盛

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专职委员刘贵祥大法官在全国法院金融审判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题为“关于金融民商事审判工作中的理念、机制和法律适用问题”的讲话（“讲话稿”），我们在上篇及中篇中对“关于进一步深化对金融审判理念的认识问题”“关于完善金融审判工作机制问题”“关于金融借款等传统金融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和“关于融资担保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四个专题进行了详细探析。本篇为本系列文章的下篇，我们将以两大实践症结问题收官，结合前沿法律观点研讨“关于有效治理‘逃废债’的法律适用问题”和“关于金融民刑交叉案件审理问题”。

01 关于有效治理“逃废债”的法律适用问题

为遏制债务人以转移资产、不合理交易、虚构债务等方式故意降低偿债能力等逃废债务的现象，切实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讲话稿指出要综合运用民法典、公司法、破产法上的相关制度工具，依法审理因“逃废债”行为引发的相关案件，切实维护市场信用环境。



1. 用好民法典债的保全制度

相较《合同法》，《民法典》在第五章“合同的保全”（第五百三十五条至第五百四十二条）中进一步强化了债的保全制度。债的保全制度包含债权人代位权及债权人撤销权两大制度。所谓代位权，是指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对相对人享有的权利，在影响债权人到期债权的实现时，债权人为保全和实现债权，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对相对人的权利。所谓撤销权，是指债务人无偿处分或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有偿处分其财产，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时，债权人请求法院撤销该等处分行为的权利。

在此《民法典》有关代位权和撤销权规定的基础上，讲话稿总结长期以来的司法实践经验，汇集了八项有关债的保全制度的裁判规则。

(1) 程序上，债权人行使代位权不需要以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为前提。

讲话稿指出，程序上，人民法院受理债权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不应以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为前提，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应当在代位权诉讼中合并审理。这里的“合并审理”，指的是在代位权诉讼中对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予以查明认定。对此，可从以下两方面加以理解分析：

- 1) **从实体来看，债权人代位权行权以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债权为先决条件：**在债权人代位权诉讼中，法院应当查明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是否存在合法有效的到期债权及债权金额。如为已决债权（已有生效法律文书），则该部分审查为形式审查；否则，法院须对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实质审查。
- 2) **从主体来看，债权人通常应以次债务人为被告、以债务人为第三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合同法》时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六条，债务人的诉讼地位限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对此，理论界和实务界曾有不同声音，尤其是在《民法典》将担保人纳入相对人后，代位权诉讼的当事人诉讼地位更为复杂，有待后续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

(2) 代位权诉讼期间，债务人的相对人向债务人履行，不应免除债务人的相对人向债权人履行的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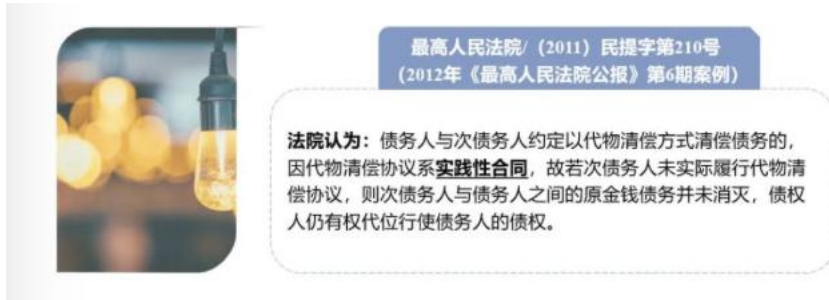
代位权的功能在于债的保全。债务人对相对人的权利本身是一项财产性权利，对该标的提起诉讼本身是一种公示性的权利宣示，故其本身即具有债的保全性质，代位权成立的，应由相对人向债权人履行义务。代位权诉讼期间，相对人向债务人履行，因与代位权诉讼的非入库规则相悖且有违诉讼诚信，故其向债权人履行的责任并不因此免除，债权人仍可请求其履行。

代位权诉讼将引起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变化。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理解与适用（一）》中的意见，可作如下理解：

- 1) **对债权人而言，**尽管债权人与相对人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债权债务，但法律规定赋予债权人直接向相对人追索的权利。一旦代位权成立，则债权人越过债务人具有接受相对人履行义务或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
- 2) **对债务人而言，**尽管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实体权利并未消灭，但在请求权层面债务人被债权人取代，债务人知晓债权人行使代位权后，债务人对债权人代位行使的权利，不得为抛弃、转让、免除、抵销等处分行为，不得提起为行使权利的诉讼。
- 3) **对次债务人而言，**次债务人在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后对债务人的给付在代位权诉讼判令给付的数额范围内不能对抗债权人。

(3) 在债务人与债务人的相对人仅达成以物抵债协议但未实际履行的情况下，债权人能够行使代位诉讼权。

针对“未实际履行的以物抵债协议能否排除代位权诉讼的适用”这一问题，司法实践中曾存在一定争议，部分法院曾以债务人与相对人达成以物抵债协议为由驳回债权人代位权诉讼。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如下公报案例之后，司法实践逐渐形成统一共识。本次讲话稿延续了最高人民法院实践观点，即在债务人与次债务人未实际履行以物抵债协议的情况下，债权人可以依据《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五条选择请求债务人的相对人履行原债务或履行以物抵债协议。



对于以物抵债协议是否实际履行的举证责任，应由次债务人承担。由于债权人代位权诉讼中对次债务是否已履行完毕的判断不仅影响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同时还影响债权人代位权诉讼是否成立的认定，因此，即使债务人对债务履行事实予以认可，仍应严格审查次债务人提供的证据是否达到确认此债务已完全履行完毕的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4）在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约定仲裁的情况下，允许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如次债务人有异议，可申请仲裁解决其与债务人之间的纠纷，代位权诉讼中止。

根据《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五条之规定，债权人行使代位权以自己的名义直接介入债务人与次债务人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方式仅限于诉讼。据此，在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订立仲裁条款的情况下，若债权人行使代位权，极有可能产生诉讼与仲裁的主管冲突。此次讲话稿从三个层面明晰了该问题的解决路径：

- 1) 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不受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仲裁协议约束：**从对人效力来看，仲裁协议具有相对性，原则上只能约束订立仲裁协议的双方当事人；从对事效力来看，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仲裁协议仅涉及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延及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
- 2) 代位权诉讼不排除次债务纠纷在一定条件下仍通过仲裁程序解决：**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二他字第19号答复（“19号答复”）指出：“债权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与债务人、次债务人之间的合同纠纷属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债务人和次债务人之间事先订有仲裁条款的，债务人或次债务人有权依据仲裁条款就双方之间的合同争议申请仲裁，债权人并非该合同法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无权对此提出异议。……要达到阻却代位权诉讼继续审理的后果，次债务人除了应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仲裁协议外，还应在此期限内提起仲裁申请。”

- 3) 代位权诉讼应中止审理等待次债务纠纷的仲裁结果：19号答复指出：“审理代位权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中止代位权诉讼，待仲裁裁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再恢复审理。”但需注意的是，受限于代位权的债权保障功能，即使仲裁已裁决次债务人应向债务人清偿债务，仍应根据代位权诉讼的判决结果最终确定履行对象。

(5) 对担保的撤销必须严格把握适用条件，避免担保权人的审查义务过重，影响担保制度功能。

根据《民法典》第五百三十八条和第五百三十九条，债权人行使撤销权是有条件的，对于严重减损债务人偿债资产的行为（无偿转让、放弃债务或担保、债权恶意延期），撤销的条件一般只要有损债权即可；但对于不合理商业行为（低价转让、高价收购、为他人债务担保），要特别重视行使撤销权的两项条件：其一为有损债权，其二为相对人非善意。针对担保这类“或有债务”是否应当被撤销，实践中已形成了一定的判断标准。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苏民终51号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公报》2020年第2辑总第68辑



针对前述标准，根据讲话稿精神，如果贯彻债权人利益优先的举证责任分配机制，加重担保权人的审查义务，势必影响担保权人开展商业交易的积极性。为此，应当如何把握撤销担保的适用条件，有待于未来司法实践的进一步明确。

(6) 在债权人撤销权诉讼中，债权人可以依据胜诉生效法律文书申请对相对人仍然占有的财产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讲话稿指出，由于《民法典》对于撤销权采取的是“入库规则”，如果仅撤销债务人与相对人之间的转让行为，而对被转让的财产不进行处置或者仅要求相对人向债务人返还财产，就可能出现债权人虽然获得胜诉判决但债权仍没有实现的情况。为此，有必要明确在债权人撤销权诉讼中，债权人可依据胜诉生效法律文书申请对相对人仍然占有的财产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该观点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部分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下称“《合同编解释征求意见稿》”）中体现为第四十八条第二款：“依据前款规定获得胜诉生效法律文书后，债权人在不超过其债权数额的范围内，对相对人申请强制执行并用于实现其债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债务人还有其他申请执行人，且相对人应当给付或者返还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实现全部申请执行人的权利的，依照法

律、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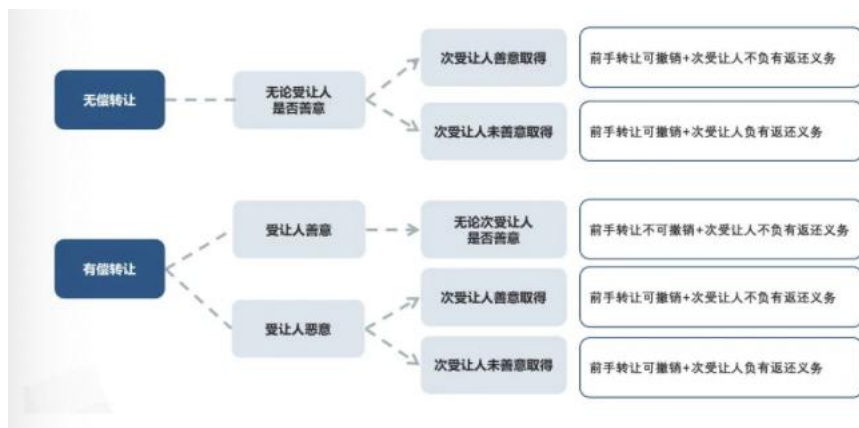
(7) 在无偿或明显不合理低价的“连环转让”情形中，在人民法院已经作出撤销债务人无偿或低价转让财产行为的生效判决后，债权人可以相对人无权处分，第三人不符合善意取得条件为由，请求该第三人向债务人返还财产。

针对无偿或明显不合理低价的“连环转让”，实践中存在两种处理方式：其一为“连环撤销”，其二为“撤销+以无权处分制度主张不符合善意取得条件的第三人返还财产”。

《合同编解释征求意见稿》对“连环撤销”进行了制度设计。第四十六条规定：“【连环转让中的撤销权行使】债务人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后，相对人又将该财产无偿转让、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或者为他人的债务提供担保，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且前后交易行为中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受让财产的人、担保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上述情形，债权人请求一并撤销债务人的相对人的行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如依据该条，债务人的相对人的行为在其非善意的情况下可撤销。对此，我们理解讲话稿的意见与《合同编解释征求意见稿》略有差异：一方面，讲话稿与《合同编解释征求意见稿》均认可债务人的相对人在其非善意的情况下可能需要承担返还财产的法律后果；另一方面，讲话稿认为《民法典》将撤销的对象限于“债务人的行为”，连环撤销将突破该等相对性，进而认为采取无权处分制度而非撤销制度处理债务人相对人的行为更为合宜，即“在人民法院已经作出撤销债务人无偿或低价转让财产行为的生效判决后，债权人以相对人无权处分，第三人不符合善意取得条件为由，请求该第三人向债务人返还财产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如依据讲话稿观点，连环转让行为中各环节交易的处理规则可归纳如下：



(8) 针对巨额交易，“明显不合理的低价”以及“明显不合理的高价”的标准应当视具体情况予以灵活调整。

讲话稿指出，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九条将转让价格未达到正常价格 70%作为认定为明显不合理低价的标准，将受让价格高于正常价格部分超过 30%作为认定为明显不合理高价的标准，仍有参考适

用之价值。但在实践中，有些交易涉及标的额巨大，即使超过70%或者超出部分未高于30%，金额也很大，而债务人与次债务人却利用亲属关系或者关联关系逃避债务，恶意诈骗债权人。为防止此类“逃废债”情况的发生，有必要对上述标准设置例外规定，不受70%、30%的限制。据此，从事金额较大的交易的金融机构及个人投资者，应特别留意按照讲话稿精神审慎判断交易价格的公允性。

2. 用好公司法的股东出资责任、法人人格否认等制度

为实现“有效治理‘逃废债’”的效果，讲话稿放宽了对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承担公司债务的适用条件，加强了对债权人的利益保护。

(1) 明确股东的出资责任

1) 在认缴资本制情况下，公司丧失清偿能力时，已到期债权的债权人要求已认缴出资但未届缴资期限的股东提前缴纳出资，可依法认定认缴出资的股东丧失出资期限利益。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九民纪要》”）第6条在强调注册资本认缴制下股东享有的期限利益的同时，明确了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特殊情形：（1）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的案件，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供执行，已具备破产原因，但不申请破产的；（2）在公司债务产生后，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或以其他方式延长股东出资期限的。

在此基础上，《公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公司法草案》”）第五十三条最新规定：“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公司或者已到期债权的债权人有权要求已认缴出资但未届缴资期限的股东提前缴纳出资。”

本次讲话稿再次反映了相同的立法趋势，即放宽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的适用条件，实现对于债权人的适当倾斜保护。

2) 对于股东转让已认缴出资但未届缴资期限股权的，首先应由受让人承担缴纳出资义务，受让人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出让人承担补充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下称“《公司法解释三》”）第十八条针对“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情形规定“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公司债权人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第二款向该股东提起诉讼，同时请求前述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此前部分司法裁判观点认为“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应当理解为“到期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出资期限未届满的股东尚未完全缴纳其出资份额即转让不应认定为“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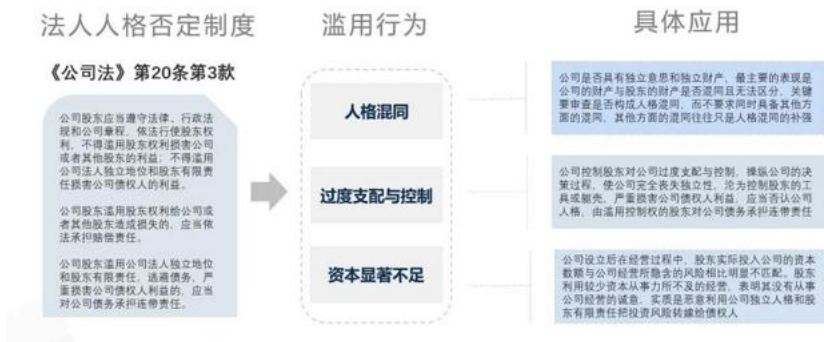
本次讲话稿与《公司法草案》意见一致，认为“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应包含“股东已认缴出资但未届缴资期限”的情形，并在责任承担方式上与《公司法解释三》相比有所变化，认为应由受让人承担第一顺位的义务，由出让人承担补充责任。

(2) 依法追究滥用人格独立地位的民事责任

讲话稿从纵向以及横向层面进行分析，强调对于控制股东、实际控制人利用其控制地位，侵占或挪用公司资产，或者利用关联交易等方式掏空公司资产，损害债权人利益，构成滥用人格逃避债务的，要依法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

1) 在纵向层面，控制股东、实际控制人构成滥用人格独立地位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现行《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仅对纵向层面的法人人格否认进行了明确规定，即“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结合长期司法实践经验，《九民纪要》对于实践中常见的滥用人格独立地位的三种类型即人格混同、过度支配与控制、资本显著不足进行了总结。对此，我们归纳如下表：



2) 在横向层面，股东利用其控制的多个公司，没有合法原因随意调拨资产、划拨资金，使得相关公司人格“躯壳化”“工具化”的，各公司应对任一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股东同样承担连带责任。

横向层面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也称“三角刺破”。《九民纪要》第11条有关过度支配与控制的条文首次在司法文件中将关联公司的横向否认作为公司人格否认的情形之一，表述为“控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控制多个子公司或者关联公司，滥用控制权使多个子公司或者关联公司财产边界不清、财务混同，利益相互输送，丧失人格独立性，沦为控制股东逃避债务、非法经营，甚至违法犯罪工具的，可以综合案件事实，否认子公司或者关联公司法人人格，判令承担连带责任”。《公司法草案》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亦试图在法律层面对横向刺破的依据予以明确，即“公司股东利用其控制的两个以上公司实施前款规定行为的，各公司应当对任一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次讲话稿与《公司法草案》的思路基本一致，对三角刺破的法律后果明确为各公司及控制股东应对任一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整体可见目前司法裁判趋势上对“刺破公司面纱”理论认识的日益加深。

除前述“刺破公司面纱”的路径外，讲话稿指出，对尚不构成滥用人格独立地位的关联公司间资产无偿或低价划转、侵占、挪用等损害公司法人财产的行为可采用其他救济路径，包括前文所述的债权人撤销权等。有关关联交易的合法性边界（尤其是涉及上市公司时），可进一步参阅我们此前发布的《上市公司争议解决（一）|论关联交易及董监高权

责界限》。

3. 用好破产法的相关制度

(1) 准确理解破产法上撤销制度和无效制度

讲话稿指出，破产法上的撤销制度是为公平清偿的需要，依法否定债务人恶意实施的不当减损破产财产行为效力，是破产法上打击“逃废债”的最直接手段。我们将破产法上的撤销制度所涉主要条文归纳如下：

破产撤销权

《企业破产法》（针对取消破产）

第三十一条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涉及债务人财产的下列行为，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一）无偿转让财产的；（二）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的；（三）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四）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的；（五）放弃债权的。

《企业破产法》（针对个别清偿）

第三十二条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行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是，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

例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

第十二条 破产申请受理前一年内债务人提前清偿的个别债务，在破产申请受理后已经到期，管理人请求撤销或追回行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该清偿行为发生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六个月内且债务人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

第十四条 债务人对以自有财产设定担保物权的债权进行的个别清偿，管理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债务清偿时担保财产的价值低于债权额的除外。

第十五条 债务人经诉讼、仲裁、执行程序对债权人进行的个别清偿，管理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债务人与债权人恶意串通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除外。

第十六条 债务人对债权人进行的以下个别清偿，管理人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请求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一）债务人为维系基本生产需要而支付水费、电费等的；

（二）债务人支付劳动报酬、人身损害赔偿金的；

（三）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其他个别清偿。

破产法下的无效行为则是指债务人实施的有害于债权人整体利益而在法律上被认定为不发生法律效力的行为，具体体现为《破产法》第十六条和第三十三条。

《破产法》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对个别债权人的债务清偿**无效**。

破产法第三十三条

涉及债务人财产的下列行为**无效**：

（一）为逃避债务而隐匿、转移财产的；

（二）虚构债务或者承认不真实的债务的。

尽管在目的和功能上具有共通之处，破产法上的可撤销行为与无效行为存在如下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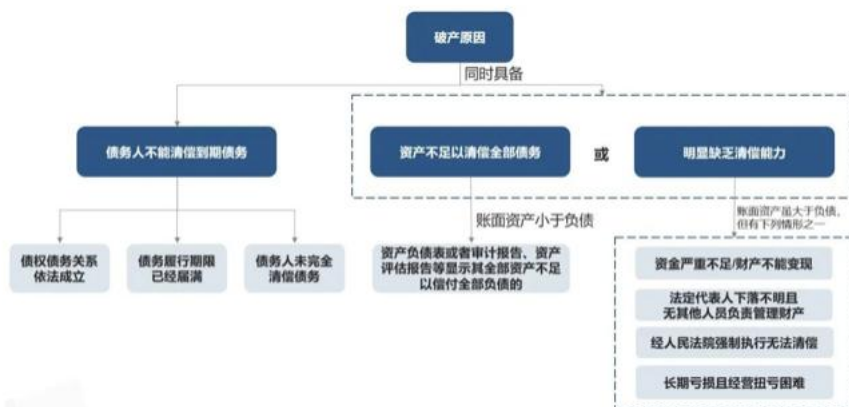
- 行权主体**：破产撤销权的权利行使主体一般只能是破产管理人；而根据民法的一般原则，对绝对无效的法律行为，没有该等行权主体限制。
- 主观恶性**：无效行为是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与可撤销行为相比较，债务人实施无效行为的主观恶性更大。
- 发生期限**：破产可撤销行为的发生期限仅限于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特殊情形下是六个月内；无效行为的发生期限则没有限制。

(2) 进一步规范破产案件的受理和审理

讲话稿强调要从案件受理阶段、审理过程进行规范，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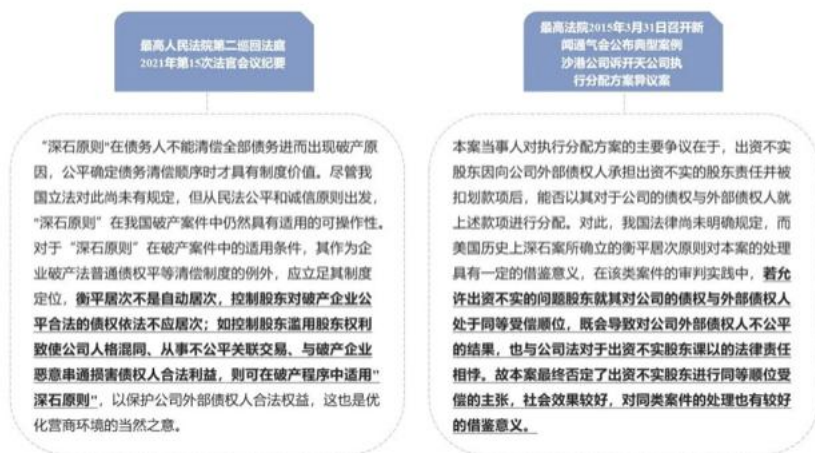
1) 案件受理阶段，对破产申请严格进行依法审查。

要依法严格审查破产申请，发现债务人资产负债情况与其公开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应当要求债务人作出合理解释，如果债务人无法做出合理解释的，应当驳回破产申请。下图为我们对现行破产法下破产申请的审查要点的简要归纳：



2) 案件审理阶段，要加强财产调查和清收工作，充分听取各类债权人意见，调整过错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将不当关联债权列为劣后债权处理。

讲话稿在此处提及对于股东等关联人不当利用关联关系形成的债权，应当作为劣后债权处理，此即“深石原则”。尽管“深石原则”在立法层面尚未有明确规定，但在司法层面，已有相关适用上的尝试：



(3) 要加大对相关主体的责任追究

1) 对于破产管理人，《破产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管理人应当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该条属于原则性规范，明确了破产管理人应当履行勤勉忠实的法律义务；第一百三十条规定，管理人未依照本法规定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处以罚款；给债权人、债务人或者第三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于管理人恶

意确认虚假债权、故意不行使破产撤销权、不予清收破产企业对外债权等损害债权人的行为可以依照前款规定追究其责任。

- 2) 对于董监高，若违反忠实勤勉义务，致使债务人破产，可依据《破产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追究其赔偿责任。讲话稿在责任主体范围上进一步扩大，认为债务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过错的，应当共同承担责任。
- 3) 对于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若实施了经管理人主张行为无效或者撤销后仍无法弥补的行为，根据《破产法》第一百二十八条，债务人有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规定的行为，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整体上，讲话稿指明对相关主体追责的法律路径，对于破产程序中债权人利益的保护无疑有较大的积极意义。然而，对于破产程序中对相关主体的追责，司法实践案例仍较为少见，诸如忠实勤勉义务的判断标准、债权人的损害赔偿范围等细节问题仍有待理论和实务界深入探讨和研究。

02 关于金融民刑交叉案件审理问题

在我们的往期文章中，《基金争议解决（九）——私募基金纠纷中的刑民交叉问题》上下篇已针对私募基金纠纷中民刑交叉案件的程序和实体处理进行了详细阐释。这里我们对于已经探讨的内容不再赘述，着重探讨讲话稿所体现的新趋势。



1. 关于金融民刑交叉案件的程序选择标准

人民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主要采用刑事程序吸收民事程序、“刑民并行”和“先刑后民”三种审理方式。“同一事实”的认定是决定上述三种审理方式的关键，结合讲话稿我们补充如下三点：

(1) 对于“同一事实”的认定，需要结合主体和案件基本事实；如涉及同一事实，则由刑事程序吸收民事程序，否则应按“刑民并行”处理。

按照讲话稿观点，判断是否为“同一事实”主要从两方面出发：第一步，审查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主体是否相同，如主体不一致，则显然不能认定为“同一事实”，如主体一致，则需

要进一步审查案件基本事实；第二步，审查刑事案件基本事实和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关系，如两案基本事实存在竞合或基本竞合的，可认定构成“同一事实”，如两案基本事实无关的，则认定不构成“同一事实”。此处的“基本事实”，应当分别指民事案件中据以认定当事人民事权利义务与责任的事实，及刑事案件中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按照“一事不在理”原则，一旦刑事程序吸收民事程序，人民法院对民事诉讼应依法不予受理或者裁定驳回起诉。

一是从行为实施主体的角度判断。“同一事实”指的是同一主体实施的行为，不同主体实施的行为不属于同一事实。要特别注意的是，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以及其他工作人员等对外以法人名义从事的职务行为，应当由法人承担相应的民事后果。如果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以及其他工作人员构成犯罪，但法人本身不构成犯罪的，鉴于犯罪行为主体与民事行为的主体属于不同的主体，一般不宜认定为“同一事实”。

二是从法律关系的角度进行认定。如，刑事案件的受害人同时也是民事法律关系的相对人的，一般可以认定该事实为“同一事实”。实践中，侵权行为人涉嫌刑事犯罪，被保险人、受益人或其他赔偿权利人请求保险人支付保险金；主合同的债务人涉嫌刑事犯罪，债权人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因涉及不同的法律关系，均不属于“同一事实”。

三是从要件事实的角度认定。只有民事案件争议的事实，同时也是构成刑事犯罪的要件事实的情况下，才属于“同一事实”。如当事人因票据贴现发生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汇票的出票人因签发无资金保证的汇票构成票据诈骗罪，但鉴于背书转让行为并非票据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因而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不属于“同一事实”。

讲话稿特别强调了**涉众型刑事犯罪**（如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刑事先行**”。

《九民纪要》第129条规定，对于涉众型经济犯罪，**所涉人数众多、当事人分布地域广、标的额特别巨大、影响范围广，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对于受害人就同一事实提起的以犯罪嫌疑人或者刑事被告人为被告的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并将有关材料移送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或者正在审理该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受害人的民事权利保护应当通过刑事追赃、退赔的方式解决。

（2）在“刑民并行”的案件中，如果存在民事案件必须以相关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情形，民事案件应当裁定中止审理，采“先刑后民”模式。

在刑事与民事案件分别审理的过程中，如民事案件的审理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应当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裁定中止诉讼。讲话稿对实践中“民事案件的审理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主要情形进行了列举：

民事案件的事实认定或者民事责任承担，
需要以行为人所涉刑事案件处理结果为依据

例如：保险人以被保险人故意犯罪导致其伤残或者死亡而拒赔的，在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作出前，民事案件应当**中止审理**。

民事基本事实明显依赖于刑事诉讼查证，
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更有利于民事案件查清基本事实

例如：存款人所持存单与银行记账不符，且存在额外获取高额行为，存款人是否与涉嫌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的银行工作人员存在共谋这一事实，民事案件难以查清的应当**中止审理**。
例外：因犯罪嫌疑人逃匿等客观原因致使刑事程序久拖不决的，民事案件可就能够查清事实的部分，先行判决并执行。

2. 关于民刑交叉案件的合同效力认定

此次讲话稿延续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的立法精神，对于涉及犯罪的合同效力，依法应根据《民法典》第一编第六章第三节“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和第三编第三章“合同的效力”部分加以认定。



我们在《基金争议解决（十）——私募基金纠纷中的刑民交叉问题（下）》中对此已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这里结合讲话稿的要点予以补充，讲话稿对于将犯罪行为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分为三类：

（1）意思表示不真实

对于意思表示不真实，讲话稿强调可能导致无效和可撤销两种后果。如为可撤销合同的，受害者可衡量维护合同效力是否对自己更有利，进而选择诉请继续履行或诉请行使撤销权。典型如各类诈骗犯罪，包括合同诈骗罪、各类金融诈骗罪等。

对于双方虚伪行为，虚假意思表示无效，但根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如果当事人双方以虚假意思表示隐藏真实意思表示，则该真实意思表示订立合同的效力，应根据《民法典》及其他民事法律关于合同效力的规定进行认定。

（2）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

《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行为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讲话稿明确认定该等无效情形是否成立应严格审查合同主体与犯罪主体是否存在一致性，并将适用情形严格限定在合同订立阶段。具体而言：

1) 在合同订立阶段：

- 主体一致性上：合同一方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职务代理人与合同相对方恶意串通，个人构成犯罪而**单位未构成犯罪的**，不应认定作为合同一方的单位与合同相对方构成恶意串通而宣告合同无效。
- 过错程度上：恶意串通无效规则不适用于合同一方构成**过失犯罪**的情形。

2) 在合同履行阶段，合同各方恶意串通构成犯罪的，**不影响之前订立的合同效力**。如在金融借款合同订立后，借款人通过行贿与银行工作人员恶意串通，形成虚假不良贷款并

致使银行核销贷款的，该犯罪行为不影响金融借款合同效力。

(3) 违反法律或者公序良俗

《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1款和第2款分别规定了合同因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和因违背公序良俗而无效。讲话稿指出，虽任何犯罪都违反了法律，但在金融审判中，既不能一概认定合同因当事人犯罪而无效，也不能一概认定合同有效，而应从违法性程度和保护刑事被害人两个维度，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此，我们曾在《**基金争议解决（十）——私募基金纠纷中的刑民交叉问题（下）**》中进行讨论。此次讲话稿以列举的方式提示了合同因涉及犯罪而无效的几种常见情形，认为除该等情形外一般不宜以合同当事人构成犯罪而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1款认定合同无效。



对于更为抽象的公序良俗原则，讲话稿则认为应当更加审慎，须结合犯罪所侵害的法益、罪名立法目的以及犯罪与合同的关系，认定合同的效力。

结合本系列文章中讨论的六大专题，我们理解，讲话稿实质是结合宏观的法律理念对过往的司法实践经验进行了阶段性的总结，并结合基本的法理共识对既有规则未予明确的前沿问题和立法趋势进行了先期性的阐释，将对此后的金融民商事审判发挥重要的指导性作用，在此我们也期待《全国法院金融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正式落地。



上海市律师协会
银行业务研究委员会
法律资讯
二〇二三年六月【第三十八期】